

林孝庭，《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  
(1928-1949)》

朱麗雙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320頁。

呂 迅\*

林著原書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於 2006 年由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推出以來，好評如潮。這次又經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延請同行學者翻譯付梓，在一定程度上可謂填補了中文世界有關國民政府西藏政策研究的空白。書名中的「邊疆」(frontier)一詞即暗示當時內亞地區存在一條曠遠而朦朧的邊界線，也揭示了國民政府的西藏政策中既有現實考量，亦不乏想像的成分。

現代漢藏關係史研究曾以英文檔案為基礎取得耀眼的成績。<sup>1</sup>相較之下，中文材料則明顯較缺乏運用，以致長期處於某種論述失衡的狀態。林書即充分利用以往忽略或者新近公開的中文文獻，包括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外交部檔案、蔣中正檔案與國民黨國防最高委員會檔案、吳忠信日記以及中國大陸出版的相關檔案資料集、使藏報告書，甚至漢藏當事人的回憶錄等等，向讀者全面展示國民政府從決策者、官僚機構到執行者對西藏的觀感和意見交鋒。然而，作者不是以簡單的「漢人對藏人」框架來分析西藏問題，而是將西藏置於「國

---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sup>1</sup> 例如：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and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Hertfordshire: Roxford Books, 1989);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A. Tom Grundeld,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民黨在內亞邊疆地區進行國家建設的歷史背景之下」來討論（頁 12）。

本書明確討論國民政府時期的西藏政策，基於材料與主題，以國民黨領袖及中央政府制定邊疆或西藏政策的視角為主要面向。因此全書架構也依據國史書寫習慣，主體部分包括南京十年（1928-1937）、抗戰八年（1937-1945）以及戰後的大陸時期（1945-1949）。這樣的安排，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還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突出了該書的核心論點，即國民政府在不同階段對其「邊疆」的實際理解是不同的（頁 26）。有關西藏是否被納入「邊界」之內的討論，構成全書的一條主要線索。這也恰是作者有別於前人的最大貢獻。

作者首先交代了國民政府與生俱來的統治困境，即領土割據而充滿內憂外患。從生存的最低要求來說，蔣中正時刻「準備面對中國領土被外國勢力佔領的現實」（頁 46）。政治口號（理想）與施政力量（現實）的矛盾衝突構成了國民政府邊疆政策實施的主要特點。除了「紙上談兵」外，伴隨著國家建設，國民政府也建立眾多組織機構負責邊疆治理，首當其衝的即是行政院下轄的蒙藏委員會。與已往忽視政府官僚機構的作法相反，作者指出「蒙藏委員會並非國府中一個無關緊要的微末機構」（頁 xii）。隨後，書中詳細論述了該會在現實運作中的政治功用，強調「這個機構在蔣介石網羅和處理鄰近邊疆地區的諸省軍閥時所扮演的角色」（頁 39）。當然，國民政府的軍事部門，例如參謀本部的邊務組、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最高國防委員會（1939-1947）均對邊疆政策的制定發揮重要影響。另外，外交部亦在決策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而又尷尬」的角色（頁 42）。其與蒙藏委員會在具體意見上的糾紛，正是現實與理想之間矛盾的生動體現。

在南京十年，國民政府的國家建設取得長足的進步，卻對邊疆採取無為放任的政策。作者明確指出「邊疆」這一概念變成了中央（南京）與周邊（各省政權）互動的有效工具，南京更樂於憑藉統治「邊疆」的名義來削弱內蒙、四川、青海軍閥對抗中央的實力（頁 50）。以 1930-1932 年的川藏邊界衝突為例，四川軍閥劉文輝和十三世達賴喇嘛因分別支持甘孜地區寺院財產糾紛中的

一方而發生戰爭。根據作者的敘述，國民政府的立場不過是利用混亂「進行一定程度的政治與軍事滲透」：先是作為調解人與西藏代表達成不利於劉文輝的臨時協議，又派員前往康區招兵買馬，反對劉文輝的統治（頁 72）。此後劉文輝在四川內戰中敗北。儘管如此，為平衡新的強人劉湘在川勢力，南京又轉而支持劉文輝在康區建立西康省，並將新省分的邊界劃至漢藏實際控制線以西，毫不顧忌拉薩的激烈反對及可能「損害脆弱的漢藏關係」（頁 80）。

在「中央與周邊」這一有效的討論框架下，作者借九世班禪喇嘛返藏問題進一步論證了自己的觀點，即國民政府實施西南邊疆政策的重點區域並不在西藏，而是與西藏毗鄰的中國內亞省分（頁 115）。既往研究普遍認為九世班禪最終未能返藏是國民政府的一大損失（頁 127），並且惡化了中、西關係，有的研究甚至歸咎於國府僵硬的武裝護送政策（頁 110）。然而，作者首次提出南京從一開始（1935 年）就沒有真正打算送班禪返藏，而是「把他當作一枚棋子，以將他們的影響帶到邊疆地區」，這個「邊疆」地區即是青海（頁 115-116）。書中以「宣慰使」政治為切入點，公布了 1935-1937 年蔣中正與其心腹戴傳賢、吳忠信的秘密通信內容以及高級軍事幕僚的機密報告，並且例舉七世諾那呼圖克圖（Gara Lama Sonam Rabten）和七世章嘉呼圖克圖（Lobsang Pelden Tenpe Dronme）的類似經歷為佐證，令人信服地推導出國民政府並非熱衷於護送班禪返藏的觀點，況且此舉可能恰恰旨在避免與拉薩的衝突（頁 121）。

緊接著，抗戰八年的西藏政策是全書最富創見也最為重要的部分。國民政府遷至重慶，地緣政治格局因之改變，川省從邊陲轉化為中央，西藏已不再是遙不可及。拉鐵摩爾氏（Owen Lattimore）曾將新疆指為內亞的樞紐。<sup>2</sup>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戰爭阻斷了中國的海路，新疆和西藏內亞交通線的重要性才真正凸顯出來。中印公路以及印藏驛運線的討論，反映出國民政府對西

---

<sup>2</sup> 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50), p. 3.

藏地位的務實態度。為實現經西藏的中印驛運線，國府不惜提議拉薩作為第三方合作管理，又容忍了西藏外交局的創設。1943 年春，國府與噶廈關係因驛運問題一度緊張。以往研究認為，蔣中正曾「考慮準備利用軍事手段徹底地解決西藏問題」（頁 xiii）。然而，作者卻提出了與之相反的觀點，即國民政府其時並非真心想解決西藏問題，「保持一個模稜兩可、界限不清的國界，反而有利於被戰爭圍困的國民政府」（頁 271）。此可謂全書的核心論點之一。作者通過細心梳理戰時檔案文件，反復強調國民政府命令西康、青海部隊陳兵漢藏邊界，實際旨在防禦日本經印度北侵，「視西藏為緩衝區」（頁 171），「將青藏與康藏邊界視作戰時中國西南軍事防衛的前線」（頁 197）。

然而，這並不妨礙國民黨以大量的資金對西藏進行滲透並趁機施加政治影響。作者穿插介紹了兩個典型案例。首先是護送達賴轉世靈童拉木登珠（Lhamo Thondup）由青海赴藏一事，隨後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並得以極高的待遇參加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坐床典禮。我們之前既不清楚吳為何獲此殊榮，也不清楚英國代表被安排在翌日覲見的原因。<sup>3</sup>經作者披露，原來是國民政府替拉薩支付了青海馬步芳所要求的 400,000 銀元（相當於當時 92,000 美元<sup>4</sup>）費用，從而換來了西藏攝政熱振呼圖克圖（Jamphel Yeshe Gyaltzen）的政治回報（頁 144）。其次，是西藏革命黨作為國民黨資助的政治團體，其黨魁饒幹（Pandatsang Rapga）長期領取蒙藏委員會津貼每月 100,000 元（頁 191）一事。但當饒幹被印度政府驅逐回國後，其所建立的情報網絡也被摧毀殆盡（頁 254）。此外，另有一例作者未予介紹，即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長的開銷，尤其沈宗濂任職期間，為了贏得西藏上中層人士的好感，廣施恩惠，一次雙十節慶典就布施 28,300 名藏僧每人藏銀 3 兩。<sup>5</sup>這樣看來，除了裝點門面外，國民政府的巨額投資並未取得實質效果。

<sup>3</sup>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p. 325.

<sup>4</sup> Tsepon W. D.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York: Potala Publications, 1984), p. 284.

<sup>5</sup> 張瑞德，〈「欽差」使命：沈宗濂在西藏（1943-194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67（2010 年 3 月），頁 71。

這一點在二戰後變得更為明顯。1947年，時人把目光聚焦在國共內戰戰場時，國民政府在西藏的政治投資卻以色拉寺政變失敗、熱振暴斃而付諸東流。作者用一章的篇幅詳盡論述了國府在戰後西藏政壇動蕩中所發揮的微弱作用，揭示出軍統特工、外交部、國防部與蒙藏委員會有關西藏政策的意見分歧，分析了蔣中正最終選擇不作為的原因。明確的理由是「南京全力對付中國共產黨問題而無暇顧及西藏事務」（頁260）。但作者亦不斷暗示蔣輕信了時任攝政達扎活佛（Ngawang Sungrab Thutob）派來西藏賀勝團所表達的善意（為祝賀盟國勝利，同樣的使團也去了印度），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又一個門面工程——制憲國民大會上（頁252、258）。至此，全書的論調整體吻合了，即國民政府自始至終無力也無意解決西藏問題，不過以邊疆概念作為鞏固中央統治的工具而已。

另一方面，拉薩開始積極拓展國際空間。1948年夏，以孜本夏格巴（Tsepon Shakabpa）為首的西藏貿易使團到達華盛頓，並拜訪國務卿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標識戰後西藏國際活動能力達到高峰。作者披露，這次秘密會談完全不為南京國民政府所知，他們始終相信「西藏人僅會見了美國商業部的一些低階官員」（頁232）。其實，夏格巴向馬歇爾表達了與美國直接貿易的迫切願望，希望從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購買五萬盎司（1,420公斤）的黃金以穩定西藏幣值，甚至明確要求美國政府對印度施壓以幫助拉薩獲得「國際商貿權」。<sup>6</sup>隨後印度政府也確實做出了讓步。這次會談促使美國國務院重新考慮其西藏政策，而我們以往卻未予足夠的關注。

同樣作為邊疆，與西藏關係密切、情形相似的蒙古和新疆，在書中亦著墨不少，其中尤以有關蒙古的論斷最為得力。國民政府高層對外蒙和西藏的看法和態度是不同的。儘管國民政府在戰後承認外蒙古獨立是出於與蘇聯的政治交易，但在1945年春，蒙藏委員會和外交部就外蒙的規劃即有天壤之別。外交

---

<sup>6</sup> Letter, *The Tibetan Trade Commission (Shakabp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shall)*, August 7, 194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The Far East: China, Vol. 7*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pp. 776-778.

部試圖勸說蔣中正相信「將外蒙古與西藏同等對待極不合宜」，尤其當外蒙古已經蘇維埃化，恢復主權將非易事（頁 216）。然而，外蒙的獨立不可避免地會給西藏帶來影響。為弱化這種影響，蔣重新拋出「高度自治」方案，甚至慷慨地表示未來條件成熟時可以幫助西藏獨立。作者認為這種表態只是為了誘使拉薩派代表參加即將召開的制憲國大；至於「高度自治」的內涵，國民政府並未提及，甚至連長期存在的邊界糾紛和邊界劃定等重要議題，「也沒有加以實際考慮」（頁 226）。類似的問題也發生在內蒙政策上。作者進一步指出國民黨同樣「缺乏管治內蒙古的清晰方案」，因此在與中國共產黨的競爭中喪失了最後的機會（頁 233）。

本書適合對西藏歷史和政體具有一定瞭解的讀者，因其對於部分史事較簡略帶過。例如有關 1904-1909 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因英軍入侵而輾轉庫倫、安多、北京的第一次流亡背景，作者未加介紹，但我們知道這次經歷使得達賴喇嘛徹底打消了對滿清護主（*patron/yöndag*）的任何信心，從此尋求與英印政府的密切合作。<sup>7</sup>書中對於 1911-1912 年發生在拉薩的漢藏戰爭也只是一筆帶過，而這次戰爭以成功驅逐漢人告終，從此內地與拉薩的交通中斷十數年之久。

在西藏法律地位的問題上，作者以相當謹慎的措辭和委婉的筆法迴避了爭論，但是字裡行間無不表達了立場，暗示其對西藏問題產生原因的關切。西藏現代民族主義的興起根源於十九世紀後半葉以降滿清帝國的衰落乃至崩塌，北京作為東北亞傳統的政治中心面臨來自四面八方的挑戰，再也無力保護或約束西藏僧俗貴族。十三世達賴喇嘛統治時期（1913-1941），他迫切需要一至兩個強大的護主來代替原先的清帝。其實無論西藏民族主義的興起，抑或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都是本土菁英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國際秩序劇烈變動的回應。西藏和中國內地的境遇是相似的，面對現代化的衝擊，無力維持傳統，反而陷入安全困境之中。拉薩與國民政府之間的關係也就變得相當微妙。

---

<sup>7</sup>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pp. 47-51.

本書的譯者朱麗雙同樣是研究西藏問題的學者，將中文讀者不熟悉的地理文化名詞，以忠於原著的道地方式呈現出來，其中不乏生花妙筆。然而，譯本也存在一些疏漏之處，比如全書將 Manchuria 譯作「滿洲里」，通常應譯「滿洲」或「東北」。又如頁 268 行 4，「達賴」應為「班禪」。

全書的遺憾在於沒有使用藏文原始資料。鑒於中國大陸檔案館的開放現狀，學者可以接觸到的藏文檔案十分有限。但位於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檔案文獻圖書館，在 1996-2002 年間針對前西藏貴族和官員開展一系列口述採訪，保有 17 卷紀錄，也出版過部分回憶錄和自傳，<sup>8</sup>或許可資參考。另外稍嫌美中不足的是，對於康區與拉薩之間的歷史關係問題，作者並未深入論述。其實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曾積極爭取康巴民眾的支持。例如作者談到國民黨支持的饒幹革命黨時，並沒有進一步說明饒幹是康巴獨立的積極活動家，支持饒幹也帶有限制拉薩之意。又如談及 1935-1936 年紅軍長征到達康區時，作者敘述了共產黨對地方的動員甚至建立了政權（頁 120），但卻沒有討論中共當時的邊疆政策與其後的異同，以及紅二、四方面軍在康區的表現。<sup>9</sup>而 1949 年中國新政權中，既不乏延安培養的康巴幹部如天寶（Sanggye Yeshe），也有像喜饒嘉措（Sherap Gyatso）這樣在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任職副委員長的大格西（具宗教學位的學者）。<sup>10</sup>幸虧這一點於作者 2011 年出版的另一本專書 *Moder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A Journey to the West* 中已有所補充。<sup>11</sup>

<sup>8</sup> Thub-bstan sangs-rgyas [Thupten Sangay], *Rgya-nag-tu bodkyi sku-tshab don-gcod skabs-dang-gnyis tshugs-stangs skor-gyi lo-rgyus thabs-bral zur-lan zhes-bya-ba dge'o* [Experiences of a Former Tibetan Representative in China, 1930-1939] (Dharamsal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1982); Khe-smad bSod-nams dbang-'dus [Khemey Sonam Wangdu], *rGas-po'i lo-rgyus 'bel-gtam* [Old Man's Story] (Dharamsala: LTWA, 1982); rNam sras gling dPal-'byor 'jigs-med [Namseling Paljor Jigme], *Mi-tshe'i lo-rgyus-dang 'brel-yod sna-tshogs* [Autobiography of Namseling] (Dharamsala: LTWA, 1988).

<sup>9</sup> Liu Xiaoyuan, *Recast All under Heaven: Revolution, War, Diplomacy, and Frontier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London: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0), pp. 117-120.

<sup>10</sup> Gray Tuttle, *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18.

<sup>11</sup> 參看羅週（Joseph Lawson）對此書的評論，刊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7（2012 年 9 月），頁 159-162。

總之，本書已成為瞭解和研究現代漢藏關係史的必讀作品。此次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翻譯推介，適時彌補了中文世界對於二十世紀前葉西藏問題論述不足的缺點，對於讓更多華人理解西藏問題的來由以及國際學界對此問題的基本觀點，勢必大有裨益。